



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应用型系列教材

中国 新闻事业史

彭红燕 主编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PDG

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应用型系列教材

中国新闻事业史

主 编 彭红燕
副主编 姜小凌 范兴昕
吴鸿芳 李 明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新闻事业史/彭红燕主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6
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应用型系列教材
ISBN 978-7-307-08715-6

I. 中… II. 彭… III. 新闻事业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G21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7783 号

责任编辑: 易 瑛 卢 伟 责任校对: 黄添生 版式设计: 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e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0.5 字数: 366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8715-6/G · 1993 定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	1
第一节 中国新闻传播活动溯源	1
一、早期的新闻传播活动	1
二、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	2
第二节 官方邸报的发展与最终消亡	10
一、中国古代官报发行体制的变迁	10
二、中国古代报纸名称、报道内容及读者的演化	13
三、万历邸钞、天变邸钞与急选报	17
第三节 古代民间报纸的发展过程	23
一、宋之小报	23
二、明代京报	25
三、清之提塘小报	26
四、清之京报	26
第二章 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	31
第一节 外国传教士来华办报	32
一、《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32
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36
三、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创办的其他中文报刊	39
四、鸦片战争前的外文报刊	40
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在华外报的发展	42
一、鸦片战争后传教士报刊	42
二、鸦片战争后外商在华办报	45
第三节 鸦片战争前后在华外报的变化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53
一、鸦片战争前后在华外报的变化	53
二、在华外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55

第三章 中国民族报业的兴起与维新派的办报活动	58
第一节 国人自办报纸的开始	58
一、国人办报的呼声	58
二、早期国人自办报刊的尝试	62
三、王韬与《循环日报》	64
第二节 维新改良派创办的报刊	66
一、维新变法运动与政论报刊	66
二、康有为与《中外纪闻》和《强学报》	67
三、梁启超与《时务报》	69
四、改良派其他有影响的报刊	72
五、维新变法运动中新闻立法的尝试	75
第三节 维新派在海外的报刊活动	78
一、澳门：《知新报》	78
二、日本：《清议报》	79
三、《新民丛报》和《新小说》	79
四、梁启超新闻思想的初步形成	81
第四章 辛亥革命前后的新闻事业	87
第一节 清政府“新政”实施与报刊的勃兴	87
一、背景及概况	87
二、官报的创办	88
三、民营报纸勃兴	89
四、各种白话报纸的创办	93
第二节 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兴起与发展	97
一、香港广州地区的革命派报刊	98
二、上海地区革命派报刊	101
三、武汉地区革命派报刊	110
四、海外革命派报刊	114
五、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	123
第三节 清末新闻立法	124
一、清末新闻法制建设的背景及经过	124
二、清末新闻法制的主要内容	126

三、清末新闻法制的性质·····	127
第五章 民国初年的新闻事业·····	130
第一节 袁世凯统治下的新闻事业·····	130
一、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短暂繁荣·····	130
二、袁世凯对新闻事业的残害·····	134
第二节 北洋政府统治下的新闻事业·····	140
一、北洋政府对新闻事业的钳制·····	140
二、民国初年新闻事业的职业化·····	142
三、民国初年一批杰出的新闻记者·····	145
第六章 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	151
第一节 《新青年》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151
一、《新青年》的创办与陈独秀·····	151
二、《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152
三、《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与李大钊·····	157
第二节 《每周评论》与学生刊物·····	158
一、《每周评论》的创办·····	158
二、学生会刊·····	161
第三节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	164
一、《新青年》改组·····	164
二、《共产党》月刊创刊·····	165
三、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工人报刊·····	166
第四节 五四时期新闻业务的变化·····	167
一、政治思想评论的发展和自由讨论风气的出现·····	167
二、倡导新文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	168
三、记者队伍建设和国际通讯报道的加强·····	169
四、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副刊和杂志的革新·····	171
第七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174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事业·····	175
一、中共中央及地方区委机关报刊·····	175
二、青年团报刊及其他群众性报刊·····	180

三、中国共产党主办的通讯社·····	184
第二节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的新闻事业·····	185
一、国民党报刊网及中央通讯社的初步建立·····	185
二、国民党右派报刊·····	189
第三节 民营新闻事业的发展·····	191
一、沪上两大民营报纸 《申报》和《新闻报》·····	191
二、民营报的后起之秀：新记《大公报》·····	195
三、成舍我的“世界”三报·····	199
第四节 中国广播事业的诞生·····	201
一、外商在华创办电台·····	201
二、中国人自办广播电台·····	202
第八章 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	204
第一节 国统区党派新闻事业·····	205
一、国民党党营新闻事业网的建成与稳步发展·····	205
二、国民党的新闻立法与新闻管制·····	208
三、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报刊·····	209
四、左翼新闻活动·····	210
第二节 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	211
一、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事业·····	211
二、军队报刊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报刊·····	214
第三节 国统区民营新闻事业·····	216
一、《申报》的变革·····	216
二、《新闻报》股权转让风波·····	218
三、张竹平与四社联合办事处·····	220
四、十年内战期间的《大公报》·····	222
五、成舍我的《民生报》、《立报》·····	225
六、邹韬奋的“六刊一报”·····	226
第九章 抗战时期的新闻事业·····	230
第一节 抗战时期国统区新闻事业·····	230
一、国民党新闻中心大迁徙及发展趋势·····	230
二、抗战中兴起的报刊和新闻团体·····	233

三、国统区的共产党报纸 《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	237
第二节 抗日革命根据地新闻事业·····	239
一、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	240
二、各抗日根据地报刊的发展·····	244
三、根据地新闻界整风与《解放日报》改版·····	246
第三节 沦陷区的新闻事业·····	248
一、日伪新闻业·····	248
二、沦陷区的爱国报刊·····	250
第十章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	253
第一节 国统区的新闻事业·····	253
一、国统区新闻中心的转移和新闻事业的重建·····	253
二、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新闻事业·····	255
三、民营新闻事业的发展·····	257
四、国统区新闻抗暴事件·····	259
第二节 解放区的新闻事业·····	262
一、解放区新闻事业概况·····	262
二、解放区新闻事业的两大宣传·····	266
第三节 共和国成立前夕新闻格局的变化·····	271
一、国民党新闻事业退出大陆·····	271
二、中间报刊“左”转·····	272
三、共产党大陆新闻事业网的初步建立·····	276
第十一章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与发展·····	280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1949—1956）·····	280
一、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创建与初步发展·····	280
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探索与实践·····	284
三、1956年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改革·····	286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曲折进程（1957—1976）·····	287
一、整风运动与反右派斗争中的新闻事业·····	287
二、“大跃进”运动中的新闻事业·····	289
三、新闻事业的调整和发展·····	290
四、“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	292

第三节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改革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	293
一、拨乱反正中的新闻事业	293
二、改革开放中的新闻事业	294
三、我国新闻事业的改革成就	296
第十二章 台湾、香港、澳门的新闻事业	299
第一节 台湾新闻事业	299
一、1949年以前的台湾新闻事业	299
二、国民党迁台后的新闻事业	300
第二节 香港的新闻事业	303
一、香港报刊业	303
二、香港广播电视、通讯社等	307
三、香港新闻媒介的管理	309
第三节 澳门新闻事业	311
一、报刊	311
二、广播电台、通讯社	312
主要参考文献	316
后 记	319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

第一节 中国新闻传播活动溯源

一、早期的新闻传播活动

信息传播活动的起源应当很早，可以肯定地说，从有人开始，就有了信息传播活动。因为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共同的社会劳动必然要求协作，而协作中必然有信息传播的存在。人类最早和最常使用的传播方式是口耳之间的传播即口头传播。口头传播的辅助手段有结绳、图画、雕刻、标识、烽烟、旗鼓、木铎等。其中旗鼓、烽烟常用于军事。《孙子兵法》：“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木铎作为一种宣政采风者的标志而存在，与信息传播有一定关系。据《左传·襄公十四年》师旷引《尚书·夏书》称“每岁孟春，道人以木铎循于路。”早在夏、商、周时期，就有这样一种被称为“道人”的政府官员，摇动木铎，巡行于各地，既宣达政令，又进行采风。可以讲，这是我国新闻事业的最原始形态。故前人一度把木铎作为新闻事业的象征，近代的个别报纸曾以“木铎”作为自己的注册商标。

现在看来，中国历史上先秦时期主要的传播形式是口头传播，文字传播仅作为一种辅助存在。这首先是因为文字仅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其次是因为传播载体的局限。但口头传播的情况如何，实已无法考证。

最早的文字传播载体是甲骨、金文和岩刻等。多见于夏商周，主要用于记载重大事件、祭祀、占卜、帝王诏书与国家法令、颂德纪功，起到一定的信息传播作用。至于春秋战国时期，则有竹木简出现。

推想起来，中国历史上信息传播的第一个发达期应是春秋战国时代。群雄割据，处士横议，必然促进了信息传播的发展。《左传》中就有许多记载，《春秋》甚至被称为“断烂朝报”。保存至今的诸子百家著作中，就有不少关于传播功能、传播效果、传播心理、传播技巧、传播规则等方面的分

析和论述。

秦王朝应是加强文字传播功用的第一个时代。因为要建立与统治一个疆域广阔的帝国，没有文字传播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秦代制订出全国统一的文字——小篆，解决了以文字形式向全国发布新闻的一个障碍。

两汉时代，用文字传播信息的活动进一步加强，逐步进入以文字传播为主的时期。汉代邮驿制度进一步发展，并设有相应的职能部门及负责人，封建政府内部的信息传播体制日趋完善，面向全国臣民的政令发布工作经常化、规范化。

甘肃北部、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额济纳河流域是古“居延”地区，是驻军屯田之地，在1930年和1972年两次发掘中，获简牍3万余枚。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出1217枚。简牍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有不少是来自朝廷的涉及国内政治军事方面的信息。

两汉时代早期传播载体以竹、木简和绢帛为主。造纸术始于西汉后期，至东汉和帝元兴年间（公元105年）基本完善，称为“蔡侯纸”。但当时产量较低，直到公元403年，东晋桓玄下令废简用纸以后，才开始大行其道。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军阀割据、战乱纷扰的时代，也是新闻信息的传播与社会舆情十分活跃发达的时代。典型的是曹魏专门制定过《邮驿令》的单行法。布告与露布是主要的传播媒体。所谓“布告”，即“布告天下”的政府文告，在固定地方悬挂与张贴，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书和各级政府的法令。“露布”则主要是帛或木板，“露面宣布，欲四方速知”。主要用于军事信息，特别是胜利消息的传播。宋代高承《事物纪原》说“后魏每征战克捷，欲天下闻知，乃帛建于漆竿之上，名曰露布。”布告与露布这两种传播载体一直延续下来，后世直到明末仍有运用。

魏晋甚至秦汉时期就有了丰富的信息传播活动，是不是可以说中国已经有了新闻传播事业了？答案是否定的。有了新闻传播活动并不等于新闻传播事业的诞生。一般认为，新闻传播事业出现至少有几个条件：一是要有一定的物质媒介作为载体；二是这种传播要面向一定数量的人群；三是传播活动要常态化；四是要有较为固定的从业人员。至少从现有的历史资料看，这些条件在魏晋时期还不具备。那么，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起源于何时呢？

二、中国古代报纸的起源

1. 关于中国报纸起源的几种猜测

报纸是人类新闻传播事业所运用的最早的一种形式，有了报纸就意味着新

闻事业的诞生。报纸 (Newspaper), 是一种以报道新闻刊载评论为主, 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出版物。这种出版物, 严格说来, 是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信息交流活动, 是它得以出现与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造纸工业和印刷技术, 是它得以大量出版发行的必要条件。但是,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 都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这种完全意义的报纸, 也不是突然一下子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是经历了一定的过程, 逐步地孕育发展起来的。在中国, 这一过程十分悠久而漫长。

关于中国报纸的起源, 有几种说法:

周朝说。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外国人。如日本后藤武男在《新闻纸研究》一书中说“原始新闻纸(编者按:即报纸。)的发行,中国比罗马还早,就是比着于西历纪元前60年罗马所发行的公报还早。较此早900余年前的同时,已经有所谓‘京报’这种新闻纸在刊行。”^①日本新闻学者杉村广太郎和美国新闻学者白瑞华也都持这种观点。

宋朝的王安石曾经把孔子编辑的《春秋》称为“断烂朝报”,似乎东周时期就已经有了报纸。

以上这些说法,大多是揣测之辞,没有足够的史实根据。所谓《春秋》是最早的报纸,也只不过是就《春秋》所记录的史事和文风与后世的报纸作一些简单的类比,并没有把它们完全等同于报纸。可见此说难以成立。

汉朝说。日本人楚人冠在《新闻学》一书中探讨中国报纸起源的时候,曾说中国古代的邸报“始于汉朝”。并说“由汉朝以迄清季,初为诸侯所阅,继而民间亦阅。若从汉朝起,距今已两千年,亦为世界最古之新闻纸。”还有一位英国牛津大学的新闻史学家安东尼·史密斯,他在《报纸·国际历史》一书中写道“中国汉朝的统治者曾安排通过一个有条不紊的收集网,得到他们辽阔国土上的新闻报道。官吏写好报道,由邮驿传递。报道经核正后,在称之为‘邸报’或‘朝报’的手抄报纸上发表。”

著名新闻学者戈公振也持这种观点,1927年,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汉唐当藩镇制度盛行时,其驻在京师之属官,皆有‘邸报’之发行。”^②当代新闻史学者姚福申和张涛,对近年出土的汉代竹木简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简牍

^① 后藤武男《新闻纸研究》,转引自《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上海:光华书店1930年版,第16页。

^② 《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刊于1927年《国闻周报》四卷五期,转引自《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具有官报的性质，张涛直接称之为“木简报”。但新闻史学者们普遍认为，汉朝虽具备产生报纸的一定的客观条件，史传中也多次提到，但还不曾有过关于报纸自然应运而生的记载。现存汉朝文献中，也看不到“邸报”字样。因此，汉朝说也是不能成立的。

目前为新闻史学界所承认较可靠的说法是：中国的报纸开始出现于唐朝。

2. 唐代的官报

中国古代报纸开始出现于唐代，最早的报纸是在封建官僚机构内部发行的政府官报。作出这一判定主要有三个依据：一是唐人的直接记载，二是唐代文字资料的间接证明，三是发现了两份实物。

(1) 依据之一：孙樵《读开元杂报》

该短文见于孙樵所著《经纬集》，全文如下：

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自长安来者，出其书示之。则曰：“吾居长安中，新天子嗣国及穷虏自溃，则见行南郊礼，安有籍田事乎？况九推非天子礼耶？又尝入太学，见丛臂负土而起若堂皇者，就视得石刻，乃射堂旧地，则射堂废已久矣，国家安能行大射礼耶？自关以东，水不溉田，则旱败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家役者。吾尝背华走洛，遇西戎还兵千人，县给一食，力屈不支；国家安能东封？从官禁兵安能仰给耶？北虏惊啮边毗，势不可控，宰相驰出责战，尚未报功，况西关复惊于西戎，安有扈从事耶？武皇帝以御史窃议宰相事，望岭南走者四人，至今卿士舛舌相戒，况宰相陈奏于仗罢乎？安有廷诤事耶？”语未及终，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布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然尚以为前朝所行，不当尽为坠典。及来长安，日见条报朝廷事者，徒曰今日除某官，明日授某官，今日幸于某，明日畋于某，诚不类数十幅书。樵恨不生为太平男子，及睹开元中书，如奋臂出其间，因取其书帛而漫志其末。凡补缺文者十三，改讹文者十一。是岁大中五年也。

孙樵，字可之，又字隐之，关东人，生卒年不详，大约在唐宪宗到僖宗时期。他“幼而工文，得其真诀”，是韩愈的再传弟子，晚唐著名散文家和中上

级政府官员。他的这篇文章，以唐代人，写唐代事，并有所议论，历来被认为是研究唐朝新闻事业的重要文献。

文章中，关于开元杂报的外观提了两点：第一，“数十幅书”。也就是几十张未加装订的单页书面材料。第二，“系日条事，不立首末”。也就是按日记事，没头没尾，各页之间，互不衔接。

关于内容，举了几个例子，即“某日皇帝亲耕籍田，行九推礼。”“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等等。并说这类纪事，“凡数十百条”。所举的这几件事，有些在《资治通鉴》中是可以查到的。这些事，已知的时间上限是开元十二年（724年），下限是开元二十三年（735年）。

开元时期，藩镇制度已初步建立，各地纷纷设立节度使，各节度使和未设节度使的地方诸道，都在首都设有邸，并派人主持工作。孙樵在“襄汉间”曾经读到的，很可能就是开元年间长驻首都的山南道邸吏们，根据当时中枢部门“条布于外”的时事性政治材料，传发到地方的。它的存在，为唐代中期以后逐步发展起来的“留邸状报”即后来的“进奏院状报”，提供了一个物证。

由于孙樵看到的这“数十幅书”“不立首末”，又无任何款识，因此并无正式名称。“开元杂报”只是孙樵在行文时随意加上的称呼，意为有关开元时期政事消息的杂乱报道。并不是它的原来名称。

《读开元杂报》一文，还记载了作者来到长安以后，“日见条报朝廷事者”这件事，并举出内容。这些记载说明，大中五年（851年）前后孙樵在长安时期，长安存在着每天传报皇帝起居和官吏任免之类政事消息的活动，存在着从事这项传报活动的人，存在着相应的传播工具。对于最后这一点，孙樵在文章中并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但他是在和“开元杂报”类比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所感慨的是两者内容所反映出来的王朝的隆替和兴衰，可见他当时所“日见”的，正是和开元杂报同一类型的东西。这隐约地反映了唐代早期报纸的情况。

（2）依据之二：时人的间接记载

唐代是一个空前繁荣强大的朝代。其驿运制度比较完善，全国驿站的总数达1643所。唐代的造纸、印刷工艺，也有较大进展。这些都为报纸的诞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有史记载的历时最久的信息工程是在中国实施的，因为大约从公元750年开始，中国宫廷就每半年一次发行有关臣民状况的报告，同时还发行月报和皇历。大约从1360年起，这类统称为邸报的公报每周发行，到了1830年，它们又成为每日出版物。后来人们称为《京报》的公报一直出版到1911年帝国

终结时为止。另外一种为省级长官印制的出版物是在大约公元 950 年出现的，它也出版到 1911 年。”^①

但从已掌握的材料看，初唐时期还没有发现关于报纸的记载。唐代报纸的孕育和发展，是和唐朝邮务及藩镇制度的发展紧密联系的。

自汉以后的中国各王朝，都允许地方在首都设邸。唐初，首都长安有不少京外诸道和诸州设置的邸舍。太宗贞观年间，曾下诏“就京城内闲坊，为诸州朝集造邸第三百余所”。主要供地方长官和诸侯们进京朝觐时作居停之用。

唐中期，开始在一些边疆地区建立藩镇，设置节度使。唐玄宗开元时，已在沿边地区设有河西、陇右、幽州、剑南、朔方、天兵、安西、北庭八个节度使。安史之乱后，又在全国广泛设置，“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到 9 世纪初，全国节度使已发展到四十几个，这些节度使拥兵自重，成为地方上的实权人物，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形势。

随着藩镇势力的日益发展，各节度使纷纷在京都设邸，除了作为居停的馆舍以外，还兼有藩镇们派驻朝廷的办事机构的作用。称呼上也由一般的邸，改为上都留后院或上都邮务留后院。代宗大历十二年（777 年）后，又改称为上都知进奏院，有时也简称为邸或留邸。

进奏院负责人的正式职称，最初叫上都邮务留后使，简称上都留后或留后，大历十二年上都留后院改为上都知进奏院后，改称为上都知进奏院官，简称进奏官。由于进奏院和以前的邸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各时期的进奏官也被社会上泛称为邸官、邸使、邸吏。最初担任进奏官的，有不少是地方藩镇留在京都的质子。及至藩镇力量渐长，派驻首都的进奏官也由质子换成亲信的将领。这些进奏官由地方派遣，只对派遣他的藩镇和诸道长官负责，不受朝廷管辖。其任务正如柳宗元在《分宁进奏院记》中所说，是“历闾阖，登太清，仰万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王宫九关而不间，辕门十舍而如近”。既为所代表的地方长官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向政府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

关于这种进奏官的报告，许多历史文献中都有提及，而且有“进奏院状报”、“状报”、“报状”、“邸吏状”、“报”等多种称呼。如《李义山文集》卷一《为濮阳公论皇太子表》：“臣得本道进奏院状报。”李义山即李商隐。崔致远《桂苑笔耕录》卷一《贺改年号表》：“今月某日得进奏院状报，奉

^① 迈克尔·埃默里 《美国新闻史》，第 9 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 页。

十一日宣下，改广明元年为中和元年。”崔致远名不见经传，只知曾任都统巡官和侍御史供奉，广明、中和前后任淮南节度使幕僚，《桂苑笔耕录》是他在淮南任职期间，代节度使高骈所写的表章和公私应酬之作，其中提到“进奏院状报”的不下十余处。如刘禹锡代杜佑作的《谢男师损等官表》：“伏见今月一日制，授臣长男师损秘书省著作郎、次男式方太常寺主簿，又得进奏官裴邁状报，伏承圣恩，特降中使送官告到臣宅，分付师损者。”等等，非常之多。

(3) 依据之三：敦煌进奏院状

在现存的敦煌文物中，近年来先后发现了两份唐代的进奏院状。都是唐僖宗时由驻地在沙洲的归义军节度使派驻朝廷的进奏官发回沙洲的。因为沙洲在今敦煌地区，这两份进奏院状又曾被长期封存于莫高窟，属于敦煌文物，所以被称为“敦煌进奏院状”。

目前分散于世界上13个国家的数万件敦煌文物，是11世纪初，被当时人秘密封存在今敦煌莫高窟第16号窟内的。直到1900年6月22日，才在偶然的情况下，为当时主持莫高窟千佛洞香火的王圆箎道士所发现。1902年以后，开始零星地为地方官员和过往的外国人骗取，1904年至1911年这一段时期又大量为专程而来的外国人所豪夺。其中以英籍匈牙利人、地质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取走的数量最多。前者于1907年和1914年两次到敦煌，仅以500两银子的代价，就取走了各种文物共31箱9600余件。现藏伦敦不列颠图书馆。后者于1908年到敦煌，也仅以每捆50两银子的代价，取走了各类文物共10余箱6000余件。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新发现的这两份进奏院状，就分别属于这两家图书馆的藏品。

藏于伦敦的那一份，发现于1982年，是唐僖宗光启元年（887年）前后，长驻首都的归义军节度使进奏官张义则发回给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的进奏院状报。当时，唐僖宗受到李克用的沙陀兵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的威胁，被迫流亡到兴元（今汉中）。这份进奏院状实际上是在僖宗从兴元返回长安途中，从凤翔一带发回沙洲的。原状是一张长97厘米、宽28.5厘米的横条卷，纸的外观和质量近似于白色的宣纸，文字是自右至左、由上而下用毛笔书写。纸的背面抄有大汉三年季布骂阵词文64行。（季布骂阵词是唐代最宏伟的叙事诗，七言，共320韵，640行。抄在这份进奏院状背面的只是其中十分之一。这也许正是这份进奏院状得以保存下来的一个原因。）

残存的这份状，只有60行，开头部分较完整，后半部分已佚。

进奏院

状上

当道。三般专使所论旌节次第逐件具录如左：右伏自光启三年二月十七日专使衙宋闰盈、高再盛、张文彻等三般同到兴元驾前。十八日使进奏。十九日对。廿日参见四宰相、两军容及长官，兼送状启信物。其日面见军容、长官、宰相之时，张文彻、高再盛、史文信、宋闰盈、李伯盈同行……①

从时间上看，它所报道的主要是光启三年（887年）二月十七日至三月二十三日这一个多月发生的事。从内容看，主要是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派往朝廷的第三批专使们，在兴元、凤翔两地活动的情况：什么时候到达的兴元，什么时候见的皇帝，什么时候开始就张淮深要求旌节的问题和朝廷大员进行交涉，交涉的经过情况如何，碰到什么困难，他们内部有过什么分歧，发生过什么争吵，大家说了些什么，哪些人对求旌节一事持乐观态度，哪些人比较消极，等等。

旌节是古代高级官员出使或出行时，用以显示身份的一种仪仗。唐时专以赐给各地节度使。张淮深自懿宗咸通八年代张义潮守归义军以来，已经担任了近20年的归义军节度使，但没有得到过朝廷的正式任命，也没有“赐旌节”的待遇，所以有此请求。

藏于巴黎的那一份，发现于1986年，是当时派驻首都的复姓南公的归义军节度使进奏官，从长安发回给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的进奏院状。状上没有明显的年号标志。据考证，可能是僖宗乾符五年（878年）。发报时间比前引的早大约11年。形式和外观未见著录。首尾较完整，共47行。部分原文：

上都进奏院

状上

当道。贺正专使押衙阴信均等，押进奉表函一封，玉一团，羚羊角一角，犀牛尾一角，十二月二十七日晚到院。二十九日进奉讫。谨具专使上下共廿九人，到院安下，及于灵州勒住人数，分析如后：一十三人到院安下，押衙阴信均、张怀普、张怀德，衙前兵兵马使曹先进……上四相公书启各一封、信二角。王相公、卢相公不受……右谨具如前。其敕书牒并寄信匹段，并专使押衙阴信均等押领。四月十一日离院讫。到日伏乞准此申

①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